

基于情感社会学视角的 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

王 鹏

摘 要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情感社会学强调了情感对社会秩序的双重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情感及其所伴随的遵从,构成了一套微妙的、无形而普遍的社会赏罚系统。这一系统的强制性来自个体从社会文化角度评价自我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情感通过鼓励自我控制,使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使在没有外部奖赏或惩罚的情况下都遵守社会规范,进而促进了社会控制,维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宏观角度而言,阶层情感或群体情感的形成与积累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维持或变迁的重要因素。当情感作为一种内在的控制系统失败时,某一群体或阶层成员所体验到的消极情感会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

关键词 情感 社会秩序 社会控制 社会团结

一

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或者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在社会理论中,秩序问题首先以“霍布斯问题”的形式出现:如果人们都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如何能够不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该问题。

在社会学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结构范式,强调外在的社会结构对社会秩序的作用,比如涂尔干将集体意识、社会分工和宗教视为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帕森斯则进一步指出,社会的共享价值或道德规范被制度化,并且被社会成员内化为行动准则,从而产生了稳定的社会秩序^①。罗斯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不仅需要社会为其成员提供行为的准则,还依赖于社会控制机制^②。这意味着社会要通过各种规范、制度对个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达到维持

秩序的目的。人们一般将社会控制分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前者是将社会控制的功能赋予国家机构、法律等制度化的主体,后者则强调习俗等民间规范的运作,以及社会成员所运用的非正式手段。理性选择理论范式主要从行动者理性的角度阐释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科尔曼认为,社会规范是在行动者的微观互动中形成的,行动者如果遵守规范就会获益,否则会受到惩罚,通过理性地权衡利弊,行动者会选择遵守规范,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③。

上述理论在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时

① 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p. 96—99.

② Edward A. Ross, “Social 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896(5).

③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1990, pp. 265—268.

强调社会规范、制度、结构或行动者理性的作用,均忽视了情感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形的控制机制的作用,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受理性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直将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归结为理性因素而不是情感因素,情感在传统社会学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现代社会学的情感研究随着社会学微观取向的发展而初露端倪。

符号互动论明确地将情感的动态机制整合到社会互动的概念中,库利是第一位将情感引入社会互动过程的学者。库利最著名的概念即“镜中我”(the looking-glass self)^①。他特别强调了两种情感:自豪感(pride)和羞耻感(shame)。他认为这两种情感无处不在,并且对社会控制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戈夫曼研究了难堪感(embarrassment)与自我的关系,他认为,当个体不能成功地展现自我,不能适当地讲话,不能做出恰当的情境判断,误用了舞台道具,或者表达了不恰当的情感时,观众甚至不需要真正地惩罚个体,他们的消极情感本身就会成为对他的惩罚,让他体验到难堪。在这种情形下,一种弥补性的仪式会随即出现。个体会感到后悔、遗憾,并努力呈现一个更适当的自我。符号互动论关于情感的动态变化的探讨反映了其基本的理论主旨:社会是在个体与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进行角色扮演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社会秩序是以微观际遇中的和谐互动为基础的。

随着互动理论的发展与成熟,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开始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关于情感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更是引起了社会学界广泛的讨论。

二

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自我都是从社会互动中逐渐浮现出来的,自我反映着社会,并且具有反身性。詹姆斯和库利认为,自我源于同他人的交往,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观察、体会和解读他人的言辞、面部表情或身体姿态,从中看到作为客体的自己。渐渐地,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可以将自我作为客体进行观察,想象自我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感觉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人们发展出自我意识。因此,自我在情境中的表现是一

种主动的过程。

自我是与社会结构规制下的角色扮演紧密联系的。社会结构可以被看作由各种社会位置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社会位置对应着一套社会期望系统与行为模式。个体不仅有一个一般的、在各种情境中普遍适用的自我概念,还有许多适应不同情境的身份。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的,但又有组织的社会。个体在不同的系统、组织、群体和际遇中占据着不同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以,自我又是由各种不同的身份构成的,自我的每一部分或每一种身份都与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及相关角色相对应,或者说,每一个身份都是一个“内在化的地位名称”^②。

当个体进行角色扮演时,他会认识到自我的角色身份以及他人对该角色的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与特定他人的联系,并且将自己作为客体,想象他人的态度和行动,据此控制和规范自己的反应。当个人能够根据最高层身份或一般化他人的期待,把自己看作一个处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中的客体,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时,便逐渐拥有了米德所说的完整而统一的自我。个体的情感会围绕着一一般化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或否定而变化,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行为。当得到他人的肯定,被评价为符合情感文化的标准时,个体会体验和表达出积极的情感;如果没有得到肯定,或者文化理念与自我感觉之间出现不一致时,个体会想方设法调整行为,将自我、他人与文化期望协调起来。按照斯特莱克的观点,自我认同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起源于个体的角色扮演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和文化的预期。如果按照其特定社会网络中的规范预期与文化价值,行为被评价为恰当的,个体就会唤起积极的情感;反之,如果个体认为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要求,就会体验到消极的情感。

在伯克看来,自我认同的过程是一个身份标准、自我感知与行为之间的循环^③。身份标准表达了社会文化关于某一身份的预期,自我感知是个体从一

① Charles H.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 1922, pp. 184—186.

② S. Stryk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Menlo Park, CA: Benjamin Cummings, 1980, p. 60.

③ Peter J. Burke, “Identity Processes and Social St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

般化他人的角度形成的自我评价,行为则是由身份标准与自我感知之间的比较决定的,个体的行为或者对行为的调整可以视作维持自我感知与身份标准的努力。因此,自我认同过程的特征在于个体在某一情境中对自我的评价与身份标准相一致。当自我评价与身份标准之间出现矛盾时,会引发消极的情感。比如完美主义者经常会感到紧张与压力,任何微小的偏差或失误都会导致很强烈的无意识反应。因此,完美主义者总会在如何避免他人的消极反应方面遇到困难,他们经常会感到苦恼。而个体情感反应的程度与其对某一身份的投入有关。个体对该身份的投入程度越高,他人对其角色扮演所做出的反应对个体情感的影响就越大。

三

身份被肯定或否定所带来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会导致个体对自我行动的调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控制即自我控制,这是一种复杂、高效而且非正式的赏罚系统。按照舍弗的遵从—情感模型,人们之所以能体会到外在规范具有强迫性是由于情感的作用,一方面是自豪感所带来的快乐和奖赏,另一方面是羞耻感、负疚感、难堪感所导致的惩罚。与正式的赏罚系统不同,这一遵从—情感系统可以随时出现,却无法看见。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包含了一个生物社会系统,它以无声的、连续的、无形的方式在社会成员内部发挥着作用^①。

社会控制是内在于情感对角色扮演的调节过程中的。库利用“镜中我”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在某一情境中,当个体仔细观察他人的表情、姿态时,这些姿态就会成为一面镜子,个体可以从中看到作为客体的自我。当人们从镜子中看到自我时,会想象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意识到他人的评价或判断,并且基于这种评价,他们会体验到积极或消极的情感^②。

社会秩序是由情感控制行为的力量来维持的。肖特指出,某些角色扮演的情感对于社会控制过程尤其重要,它们通过鼓励自我控制——使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使在没有外部奖赏或惩罚的情况下都遵守社会规范,进而促进了社会控制,这对社会生活特别重要,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时时监控每一个人的行为,自我管制必须成为多数社会控制的基础。符号互动论者仅仅关注到了自我控制的认知方面,

但是如果没有情感伴随,角色扮演的能力几乎是无用的^③。反思性的角色扮演情感可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消极情感通过约束与惩罚越轨行为而促进了社会控制。比如负疚感(guilt)是当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而消极地评价自我时所产生的一种情感,它会推动个体监控自己、产生自责心理,并可能从事利他行为来弥补自己不道德的行为,从而巩固道德规范,促进社会团结;羞耻感不是源自个体对自己的“不道德”的评价,而是根据一般化他人的观点,由于自我不完善、有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当个体感觉到缺乏别人的敬重与遵从时,就会消极地评价自己,并体验到羞耻感。羞耻感涉及个体的一般身份,也就是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遍身份。同负疚感一样,羞耻感也会促使个体采取利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一般身份不受损害,向他人证明自己不是缺乏能力,或在某方面有缺陷。舍弗指出,个体往往会选择服从群体或社会,这是因为他要避免由于与群体中的大多数意见或行动不一致而导致的羞耻感。当个体与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差距增大时,个体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慌乱和焦虑。阿什的实验表明,个体与大多数人意见不一致时,许多人开始怀疑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过失,担心自己不为群体所容忍的缺点会暴露出来,并且成为关注的焦点,让他们感到痛苦与烦恼^④。人们往往担心被群体排除在外,不想被群体中的其他人认为“比较古怪”。尽管群体可能并未采取行动,但个体的这种想象暗示了一种羞耻感产生的基本背景:个体认为自我受到了负面评价。难堪感,是个体认为自己在某一情境中,特别是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不适当的自我表现所产生的一种情感,难堪感会推动个体采取矫正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不称职只不过是一时的失误。

而积极的情感则通过鼓励和奖赏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来促进社会团结。比如自豪感是一种稳定、

① Thomas J. Scheff, "Shame and Conformity: The Deference—Emotion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3).

② Charles H.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 1922, p. 184.

③ S. Shott, "Emotion and Social Life: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6).

④ S. Asch,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1956(9).

持久的自我认可的情感。当个体进行角色扮演时,自豪感会让个体感觉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错,自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且这种感觉不是偶然的、短暂的,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可以体验到的。由于自豪感能够给行动者带来愉悦的感受,人们会趋向于体验这种情感,所以他们会采取行动。

总之,负疚感、羞耻感激发着个体采取利他的行动以保护自己的一般身份不受损害;难堪感推动着个体保护自己的情境身份;自豪感驱使个体维持稳定的自我。这些情感通过个体对自我与身份的反思性评价而对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

因此,正如舍弗所指出的,自豪感与羞耻感,及其所伴随的遵从,构成了一套微妙的、普遍的社会赏罚系统^①。这套遵从—情感系统之所以能使个体体验到社会力量的强制性,一方面是因为积极情感所带来的愉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消极情感所带来的惩罚。这套系统可以采取正式的、公开的形式,比如公开的颁奖或宣判,但是正式的奖赏或惩罚并不经常发生。这套遵从—情感系统的运行经常是瞬间的、无形的。

埃利亚斯的情感研究秉承了欧洲的学术传统,帮助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视角了解到人类的情感和行为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如何被控制和驯服的。埃利亚斯认为,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开始,个人的自我控制发展得特别快。从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强制到个人的自我强制这样一个较大的转变使得人的许多情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流露出来。这种自我控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更实在地渗入了人的情感本能与每一个毛孔,并严格地阻止情感和本能在没有经过控制机构准许的情况下直接付诸行动。这便是个人结构变化的核心和个人结构特点的核心”^②。换言之,随着人际关系结构的变迁,个人的情感和情感控制结构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即朝着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发展,形成具有文明化特征的言行举止。对于埃利亚斯而言,现代文明化的主要成就是,能够在行为的基本层面将个人的心理情感加以驯服。

四

情感与自我的互动不仅发生在微观的行动之间,还可能扩散到群体范围和社会的宏观层面。芭伯雷特探讨了社会宏观结构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社会结构中权力

和经济资源的分配发生变化时,不同群体的情感状态会随之做出反应^③。比如,当社会中的某一部分群体意识到他人是通过违背社会规范而获得权力和经济资源,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自己被剥夺了资源或者获得资源的机会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根据肯普尔的观点,特定的社会群体结构是权力、地位与资源的相对稳定的分布,其中某些成员必然要比另外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地位和资源,这将会导致两种情感的产生:一种是将群体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整合型情感,另一种是维持成员之间差别的分化型情感。前者通常是积极的情感状态,比如爱 and 自豪感;后者通常是消极的情绪状态,比如忧虑与愤怒。整合型情感或分化型情感的产生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地位变化有着微妙的关系。当人们的地位和资源维持在预期水平或有所增加时,地位的授受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接受者会向授予者表示感激,这种积极情感的相互表达将会促进双方的联系与团结。另外,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意见一致则会增加群体中积极情感的交流。满足、兴奋与感激等积极的情感交流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群体的团结。相反,如果人们的地位比预期有所下降,他们所体验到的羞耻、困窘、愤怒、怨恨等消极情感会以无形或有形的方式破坏群体团结^④。

舍弗分析了羞耻感与愤怒感的恶性循环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影响。在他看来,羞耻感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情感,因此,个体常常会对它有所防范。如果羞耻感被承认,可能会导致适当的自我控制;但是,如果羞耻感被压抑,比如被一些无关的言辞或吞吞吐吐等姿态所掩饰,人们会陷入一种羞耻感—愤怒感的循环。羞耻感与愤怒感的连锁反应通常很迅速,但是也可能会以极度仇恨的形式延续一生。这

① Thomas J. Scheff, “Shame and Conformity: The Deference—Emotion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3).

②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

③ Jack 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6—131.

④ Theodore D. Kemper, “Social Relations and Emotions: A Structural Approach”, in Theodore D. Kemper (e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07—237.

些消极情感可能保持潜意识的状态,驱使人们偏离主流文化;当他们感到自己的群体受到羞辱时,会集体调动其愤怒情绪,并以激进的集体行动表现出来,从而导致社会冲突。此时,情感作为一种内在的控制系统失败了,某一群体或阶层成员所体验到的羞耻、愤怒、怨恨等消极情感会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破坏社会团结、瓦解社会秩序。

探讨情感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情感社会学的宏观研究表明,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流动不畅,无法获得稀缺社会资源的阶层和群体,更容易体验到紧张、焦虑、愤怒等消极的情感,此类消极情感长期积累,不仅会在阶层和群体中蔓延,甚至可能会在代际间传递。如果固化的社会分层状况得不到改善,当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匮乏时,消极情感最终以社会特殊事件作为宣泄的出口,通过网络以非常态的方式爆发出来,这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可能是破坏性的。

近年来围绕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等不时发生群体性事件,在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处理的方式多注重强制性的控制手段,处理的主体限于国家机构、职能部门等正式社会控制的主体。从情感研究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不仅涉及当事人及其具体的问题,还承载着社会中下层民众普遍存在的焦虑、挫折感、社会不公感、相对剥夺感等消极的情感,而群体性事件的传统处理方式只着眼于解决当时的矛盾,不仅缺少对当事人消极情感的疏导,更忽视了传媒对消极情感的助推与放大作用。特别是在网络这个特殊的表达空间中,个体受到了匿名的掩护,压抑的情感会得以爆发,自我控制

随之放松,对行为后果的恐惧感大大减弱,甚至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网络集体行动。

因此,面对社会特殊事件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不仅要挖掘其社会根源,努力解决由于阶层固化所导致的深层次冲突,而且要了解社会情感的分布、表达与传播机制,特别是以适当的方式和渠道对消极情感进行疏导。

强调情感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并非要否定社会规范、制度或行动者理性的作用。一方面,人类的行动特别是社会行动是极其复杂的,以纯粹的理性维度很难得到对它的完整认识,而辅以情感的维度则可能会增加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和制度对行动者的影响也不纯然是外在的,其社会控制作用的发挥可能依赖于一套随时出现却无法看到的情感系统。

因此,有必要对情感做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探寻新的研究方法,选择适当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指标,更加精确地理解情感的动态作用机制,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群体情感的长期变化联系起来,客观地认识情感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项目号:EFA11034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王 鹏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张献忠